

豆瓣网友 某羊 | 知易行难仍需行

思索起来，上一次完整阅读黄宗智先生的作品确实已经是研究生的时候了，记得还是在刘昶老师课上，文本是关于华北和江南农村的两部经典著作，那时候“内卷化”还没有出圈，而且一度被黄教授自己更正为“过密化”，再看看如今几年的“卷”文化及其反面，实属世事易变了。

当然，也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反差感之中，却也更显出黄教授的精力充沛与目光敏锐——如今的“黄学”已然不仅限于历史的领域（或许当初也不限于），而更在时间尺度上扩展至对当下的关注，在学科尺度上转向对社会科学整体的关怀，而二者的共同指向便是其近年来倡导的“实践社会科学”——自然，也是本书及其所属丛书所倡导的主题。

所谓“实践社会科学”，即本书导论开头所言明的：

今天影响最大的社会科学采用的研究路径主要是从理论出发而得出的某种“假设”，然后搜集经验证据来支撑其假设，最终再返回到理论。笔者多年来提倡的则是要将此进路颠倒过来，即从经验证据出发，借此来检验各种理论，决定如何对其取舍、汇合、重构、推进，建立更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然后再返回到经验中去检验。（001）

易言之，通过实践的经验重审理论，进而更新理论，可谓黄教授当下研学之关键。甚至可以说，“时间的社会科学”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对自我的验证——因发现既有社会科学研究路径的弊端，而以实践为本重估研究的路径范式。

当然，有论者自然对此倡议不以为然——从实践出发升华理论本就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路径，何须如此强调？这可能就要回到“知易行难”这个说法了，毕竟应该如何与实际如何之间的张力从来都是困扰研究者们的关键存在，过去多少算是沉于水下，而此时再次强调“应该如何”，便多少算是一种使之浮出水面加以解决的宣言了。

而上述张力之所以产生，相当程度上源于理论的“普适”与实践的“个性”之间的不融洽，这在以发源自西方的理论进行中国社会研究方面尤其明显，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领域更为突出。故而本书进行“实践社会科学”的尝试也主要聚焦于此——这一目标又促成了黄宗智教授寻求同周黎安教授对话的客观需要：

从本书的分编不难看出，双方在聚焦中国社会研究，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方面各有侧重——黄教授关注的基层生态和基层组织得到了周教授“行政发包制”的有力补充，二者虽侧重不同，但得以为读者共同呈现出更为完整的当代中国分析。就此而言，二者的对话是否构成（或者说这种两个人分别根据同一大主题撰写文章凑成一本书的做法是否可称之为对话）虽存有疑问，但这种写作形式却不失为有趣的尝试。

而从二人关注的主体而言，国家对基层的治理现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说政商关系）、土地财政的机遇与困境，无疑做到了直面现实。只是上述主题的文章大多完成于疫情前与疫情初期，如今读来着实在是有一种“时代之泪”的感慨——倒也不是学者的功课太慢，只能说世界变得太快了些。事到如今，土地财政的困境、政商关系的恶化乃至基层治理的挑战较几年前已更为尖锐，中国“这辆在高速公路上飞速奔跑的旧车”（432）还能否以及如何前行，无疑更为迫切地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探寻答案，而这恐怕又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

当然，一如“实践社会科学”这个命题本身，对“中国问题”的探索也本就是一项知易行难仍需行的工作。黄、周两位在本书中也确实提出了一些破具魄力的观点策略，尤以黄宗智教授面对基层治理困境而提出的重新唤醒政党组织活力的“药方”最为引人关注（当然，想来也争议不小）——属实有一种“复古改制”的“美”了。

当然，结合同样在这几天读到的另一位黄教授的《铁水流》，黄宗智教授的方案未尝不包含一种“救赎之道”。而进一步思考，这种观点同近些年出现的重建“乡贤”（或者说“乡村能人”）群体的思路（某种意义上来说契合了“行政发包制”的思路）虽有所不同，但却皆源于对既往实践经验的重新探索——实践中的问题或许终究需要从过往的实践中探索经验，这恐怕也确实证明了“实践社会科学”的意义所在。